

论同情话语的和谐关系建构机制

——以《红楼梦》同情话语为例

周树江

摘要:作为一种礼貌言语,同情话语具有增强和谐关系的语用功能。本文探索同情话语的和谐关系建构机制,运用同情话语理论、关系面子观和顾曰国的礼貌准则作为理论框架,通过分析选自《红楼梦》的同情话语语料,论证了同情话语的面子维护过程。在交际过程中,同情话语通过参与、移情和尊重3种策略来帮助受话人获得相应的3种交际权利,即参与权、情感权和尊重权,而交际权利又从不同方面增强了受话人的公平权利、身份面子和素质面子,从而使其整体面子和权利得到维护。本文分析汉语中的同情话语,认为在建构和谐关系时,受到中国文化和汉语语言礼貌准则的制约,其建构过程和交际策略除了通用特征以外,还会呈现出某些特定汉语言文化特色。

关键词:同情话语;交际权利;和谐关系建构;文化特征;《红楼梦》

[中图分类号] H030

DOI: 10.12002/j.bisu.2016.0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539(2016)06-0015-10

引言

追求人际和谐是人类理性的表现,这为言语或非言语的合作提供了语用理据(冉永平,2012);与此同时,追求和谐又是一种无标记的元语用意识,是多数场合下交际者追求的交际目标。元语用意识存在于交际者大脑之中,属于意识层面,在交际过程中会以特定言语形式体现出来,在交际中的语用层面留下“语言痕迹”(linguistic traces)。同情话语是和谐元语用意识的重要语言痕迹,具有和谐关系建构功能。但多年来,人们在研究和谐话语时,多会关注其它以接近为基础的话语形式,如赞同话语和表扬话语(Brown & Levinson, 1987; Spencer-Oatey, 2005; 钱厚生, 2002),而对同属以接近为基础的同情话语则研究不够。笔者以“sympathy”和“同情话语”“同情话语”“同情原则”等

[基金项目] 本文得到山东省软科学项目“政府网络问政中的和谐交际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015RKB01421)和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项目“基于合作性学习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项目编号:2012436)的资助。

作为主题词分别在“Elsevier Sciencedirect”和“中国知网”上进行检索,发现相关主题的论文寥寥无几,其中涉及同情话语及其和谐语用功能的更少,只有区区两篇(García, 2012; 凌来芳, 2010)。

凌来芳(2010)依据 Spencer-Oatey 的人际关系管理理论框架,设计了问卷调查表,对汉语中同情话语行为进行了调查分析,调查结果表明,汉语使用者在表达同情时强调对交际权或关联原则的遵守。García(2012)则通过设计角色扮演(role-play)生成同情话语,然后分析并归纳总结在秘鲁文化中常用的同情策略。笔者认为,凌来芳研究了汉语中的同情话语,并得出了相关结论,但只靠问卷缺乏语料支撑略显不足;García通过生成语料的方式总结了秘鲁人的同情策略,对进行汉语中的相关研究有借鉴作用。本文将在他们研究以及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从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中选取一些同情话语作为语料,结合顾曰国(1992)的礼貌准则,分析汉语特色的同情话语的和谐关系建构机制,探讨其交际策略的汉语言文化特征。

一、同情话语与面子维护

同情话语是在“听话人遭受不幸、挫折等处于伤心、痛苦等消极情绪状态时,说话人对听话人的遭遇在感情上发生共鸣,与听话人进行情感协调与沟通,帮助听话人改变或减轻其消极情绪所实施的一种言语行为”(凌来芳, 2010: 84)。Vanderveken把同情话语行为描述为:“送去慰问,即表达同情,其条件是听话人身上发生了不幸(丧亲等)”(1990: 216)。表达同情是一种特定语境下的交际行为,“听话人遭遇到痛苦或不幸”是表示同情的前提条件,“传达某人的安慰”是表示同情的诚意条件(García, 2009)。在这一笼统概念下,同情话语会因交际语境差异而呈现出各种不同的交际策略,凌来芳(2010)总结了汉语中经常使用的9种同情策略,包括:移情策略(为听话人开脱)、消极劝慰、关注策略、积极劝慰、表达不相信和惊诧、直接表示同情、表达是同一圈内人、责备或戏谑听话人、闪避策略(转移话题)等。

同情准则是 Leech(1983)提出的六大礼貌准则之一,规定交际者在交际时要尽力夸大自身对他人的同情。在日常交际中,当交际某一方遭遇某种挫折时,他(她)通常是处于情感劣势,需要别人的安慰。出于维护和谐关系的考虑,交际另一方需要采用某种交际方式与其进行心理接近,这种交际方式通常就是同情话语。在交际过程中,同情话语是一种“垫脚石”,通过同情话语行为,交际一方把“垫脚石”置于另一方的脚下,提高了其心理位置,降低了交际双

方的心理落差,缩短了双方的心理距离。

在日常交际中,面子是介于同情话语与和谐交际目标之间的节点,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是建构和谐关系的平台。“面子”一词由 Goffman (1967) 最早提出, Brown & Levinson 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充实,提出了面子维理论。在他们看来,礼貌的交际就是“典型人”为满足面子需求所采取的理性行为,大致可分为积极礼貌和消极礼貌两种,分别维护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同情话语属于积极礼貌,维护的是对方的积极面子,这种礼貌是以接近为基础的,说话人表明自己与听话人之间有共同之处,拉近双方的交际距离。例如:

例(1)(同学甲物理考试没考好)

甲:我物理没考及格,可能要重修。

乙:没关系,我上学期也有门课重修,以后多花点时间,补得上来的。(肖晶、吕长弘,2002:320)

例(1)中的乙面对甲的诉苦使用了同情策略,通过陈述自己与甲相似的经历来安慰对方,使得对方得知别人也有此种不幸经历,觉得自己不孤单,从而维护了积极面子,降低了痛苦程度。

Spencer-Oatey (2002/2005) 认为 Brown & Levinson 的面子理论忽略了面子的人际社会交往的一面,过分强调个人因素,为此,她对 Brown & Levinson 的理论进行了改进,提出了关系面子观。按照 Spencer-Oatey 的描述,面子是发生在交际过程中的面子,指一个人在交际中获得的为人所承认的积极社会价值,可从素质和身份两个方面来规定。其中的素质面子和身份面子与 Brown & Levinson 的积极面子大体相当,但 Spencer-Oatey 强调,在面子维持过程中还要涉及两种社交权利,即公平权利和交际权利,社交权利大体相当于 Brown & Levinson 的消极面子。这样,两种面子与两种权利交互作用,共同构成了动态的关系面子观。同情话语是发生在交际过程中的言语形式,其语用意义也是在语境中呈现,两者都是动态的,需要一个与之相匹配的中介,即动态面子。基于此,笔者以 Spencer-Oatey 的关系面子概念来进行相关研究。

二、同情话语的和谐关系建构机制

在构成 Spencer-Oatey 交际面子观的4种要素中,素质面子和公平权利位于个人的、独立的层面;而身份面子和交际权利是一个社会的、相互依赖的层面。但交际面子观的关键在于这4个要素是相互关联的,共同构成交际面子这个整体。在交际中,发话人通过同情话语来维护受话人的交际权利,增强其身

份面子，从而满足某种“行为预期”（behavioral expectations）。然后这种互动层面上的面子维护意义又向个人、独立层面传导，增强受话人的公平权利和素质面子，从而使其整体面子和权利得到维护，满足了受话人的面子意识（face sensitivity）和交际需求（interactional wants），最终达到和谐交际的言后效果（perlocutionary effects）。由此看出，交际权利是同情话语面子维护的“入口”，是构建和谐关系的基础。

在 Spencer-Oatey (2005) 的论述中，交际权利又被称作交际原则（association principle），由三部分组成：参与权（人们应当有适量和适当类型的活动可参与）、情感权（人们能受到他人适当的关心，能与他人分享感受和兴趣）和尊重权（人们有权对他人表示适当的尊重）。在某人遭遇痛苦或不幸需要同情时，他（她）的交际权利可能会受到某种形式的损害，需要交际另一方在交际过程中进行补救，同情话语就是要对症下药，对具体面子和权力损害采取相应的补救策略。同情话语有不同的交际策略，分别对应上述三种权利。按照 García (2012) 的研究，交际原则下面的三种权利分别对应三种同情策略，即参与策略、情感策略和尊重策略。参与策略就是要突显与对方的共同点，尽量让同情接受方觉得有人与自己同路，属于“圈内”；情感策略是要显示与受话人同感同受，拉近交际双方的心理距离；而尊重策略是通过表扬受话人，突显他们的优秀素质，帮助他们找回自信。

同情话语是重要的礼貌策略，其交际形式要符合礼貌准则。为了研究汉语中的礼貌现象，我国学者顾曰国（1992）在 Leech（1983）礼貌准则的基础上提出了礼貌五准则，即贬己尊人准则、称呼准则、文雅准则、求同准则和德、言、行准则。礼貌五原则具有中国文化特色，为分析汉语中的礼貌现象提供了更为具体的标准，可以与同情策略结合，用来研究汉语中的同情话语。贬己尊人、称呼以及求同等准则可以增加交际双方的共同点，在参与策略中经常被使用；而称呼、求同以及德、言、行准则可拉近交际双方的心理距离，经常被用于实施情感策略和尊重策略。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除了礼貌五准则，中国文化中的一些特征也会影响汉语中的同情策略，如中国文化强调集体意识，“圈内策略”在维持和谐方面要比在西方文化中重要；反之，“圈外策略”则是有意疏远双方人际关系，在中国文化中的不礼貌程度较高。

1. 参与策略

当一个人处于逆境时，他会感到孤独，急需别人的陪伴。这种陪伴包括身体和精神两个方面，而以同情话语来表达与身处逆境者“同路”就是一种精神陪伴，有助于减轻甚至消除他们的孤独和无助感，维护其平等权利和身份面子。

同时,这种交际行为也可以拉近交际双方的关系,改善交际环境,是创设和谐关系的重要手段。

根据 Spencer-Oatey (2005) 的交际原则,参与策略从维护听话人交际参与权的角度来运作,因为这些策略表明说话人与听话人是同一圈内人并且拥有共同参与、分享、分担的愿望。要体现这种交际意图,交际者既可以通过使用第一人称“我们”“咱们”“we”等来表示与同情接收方同路,也可陈述曾经遭受与同情接收方相同或相似的困难来融入圈内,还可以用询问情况、提供建议等只有圈内人才有的话语行为表明与同情接受方的亲密关系。例如:

例(2)(语境:秦氏生病,王熙凤来府上探视。)

秦氏:任凭神仙也罢,治得病治不得命。婶子,我知道我这病不过是挨日子。

王熙凤:你只管这么想着,病哪里能好呢?总要想开了才是。况且听得大夫说,若是不治,怕的是春天不好呢。如今才九月半,还有四五个月的功夫,什么病治不好呢?咱们若是不能吃人参的人家,这也难说了,你公公婆婆听见治得你好,别说一日二钱人参,就是二斤也能够吃得起。好生养着吧,我过园子里去了。(《红楼梦》第十一回)

例(3)(语境:林黛玉向薛宝钗诉说心中烦恼)

林黛玉:人家才拿你当个正经人,把心里的烦恼告诉你听,你反拿我取笑儿。

薛宝钗:虽是取笑儿,却也是真话。你放心,我在这里一日,我与你消遣一日。我虽有个哥哥,你也是知道的,只是个母亲比你略强一些。咱们也算同病相怜。你也是个明白人,何必作“司马牛之叹”? (《红楼梦》第四十五回)

在例(2)中,秦氏生病,王熙凤去探病,对秦氏表达了同情。王熙凤分别使用了圈内策略和提供建议策略,如称呼“咱们”和“总有想得开才是”“好生养着吧”等。作为秦氏的长辈,王熙凤在劝说病中的秦氏要好生养病时,用直接祈使句“好生养着吧”,表面上看有强加(imposition)之嫌,但这符合礼貌五准则中的“称呼准则”,听话人没有感到负面面子受到损害,反而感到自己的积极面子得到维护,是汉语特色的礼貌策略。在例(3)中,林黛玉父母早亡,寄住在外婆家,倍感孤独,心里充满烦恼。薛宝钗对此深表同情,因为她与林黛玉处境相似,同为寄人篱下,虽有母亲、哥哥作伴,但自认为也只是“略强一些”。在表述同情时,薛宝钗首先陈述了自己与林黛玉相似的经历,接着又使用了第一人称代词“咱们”表示亲近,进一步拉近了她们之间的距离。在本例中,薛宝钗除了使用圈内策略与林黛玉求同外,还使用了礼貌五准则中的“贬己尊人准则”,极力贬低自己的现状,以求维护林黛玉的身份面子和平等交际权利。

与上述两例和谐交际相反，在《红楼梦》中，我们还发现有许多因误用交际策略而导致不和谐的例子，如在例（4）中，袭人在对晴雯表达同情时使用了“圈外策略”，引起不愉快，造成交际不和谐。

例（4）（语境：贾宝玉与晴雯吵架，袭人对晴雯表达同情）

袭人：好妹妹，你出去逛逛，原来是我们的不是。

晴雯（冷笑）：我倒不知道，你们是谁？别叫我替你们害臊了！便是你们鬼鬼祟祟干的那事，也瞒不过我去。那里就称起“我们”来了！那明公正道，连个姑娘还没挣得上去呢，也不过跟我似的，那里就称上“我们”了！（《红楼梦》第三十一回）

在例（4）中，袭人用“我们”把自己与贾宝玉融入圈里，晴雯感觉自己被排除在圈外，自然不愉快，使得交际变得非常不和谐。在晴雯反驳语中，“你们”或“我们”出现了5次，可见“圈外策略”对她的伤害很深。由此我们看出，圈外策略在集体意识比较强的社会里是一种不礼貌的交际策略，这也是汉语语言交际的一个特色。

2. 情感策略

陈倩、冉永平（2013）认为，情感是身心体验的过程，它既是影响人际关系的因素，也是人际交往引起的结果。在交际中，交际主体会依据自己的情感体验，通过语言来拉近或疏远某种人际关系，这种交际策略就是移情。移情广泛存在于人类的各种交往活动中，是“社会个体之间和睦相处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Arnold, 1999: 19）。Brown（2002）认为移情是“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或“跨越自我去理解、感知他人”的过程（转引自凌来芳，2010）。根据适应理论（Giles *et al.*, 1991），交际者在交际过程中通常会结合语境变化通过各种形式策略和内容的变换来缩短双方的心理距离，以实现心理趋同；或拉近双方之间的亲密程度，以体现亲情关系。交际主体之间的话语越相似，说话人的话语越具有吸引力，也就越容易被对方所理解或接受，越能体现语言的适应性。说话人的话语信息越倾向于听话人，或从听话人的视角进行语言选择等，他们之间就越容易相互吸引，从而实现人际交往中语言使用的“趋同取向”，达到交际中的和谐目标。

在一个人遭受困难或不幸时，他（她）的心情往往是非常糟糕的，同情表述者首先要认清这种语境，尽力拉近与对方的心理距离，并用各种言语和非言语形式来抒发你的心情，如表达伤心、痛苦、震惊、同情等。例如：

例（5）（语境：秦氏生病，王熙凤来府上探视。）

王熙凤（拉住秦氏的手）：我的奶奶！怎么几日不见，就瘦的这样子了！

(《红楼梦》第十一回)

例(6)(语境:贾宝玉被打,袭人表达同情。)

袭人咬着牙说道:“我的娘,怎么下这般的狠手!你但凡听我一句话,也不得到这步地位。幸而没动筋骨,倘若打出个残废来,可叫人怎么样呢!”(《红楼梦》第三十四回)

在上述两例中,发话人分别用了感叹句“我的奶奶”“我的娘”来表达对当事人处境的震惊和同情。通过表达伤心,发话人与受话人站在了一起,保证了受话人的交际权利和平等权利,同时也维护了他们的身份面子。值得注意的是,在例(6)中,袭人在表达震惊和伤心之后,责备贾宝玉道“你但凡听我一句话,也不得到这步地位”。表面上这是对贾宝玉的一种强势话语,对其身份面子和独立面子构成威胁,但鉴于交际双方的亲密关系,这符合“称呼准则”和“德、言、行准则”,与例(2)的情况相似,这不但不会威胁面子,相反还体现出袭人对贾宝玉的深深关切之情,是一种礼貌交际策略。

3. 尊重策略

Spencer-Oatey(2005)在论述素质面子和身份面子时用“attributes”和“value”来描述,这两个词都可翻译为“价值”,拥有正面价值会被认为是拥有素质面子,相反,负面价值则意味着失去素质面子。被同情方通常会因为种种原因认为自己在某一或某几方面的价值上出现不足,从而对自己失去信心,尊重策略就是设法突显对方的正面素质价值,使得他(她)重拾对自己的信心。

在进行同情话语行为时,交际双方处在不同的心理高度,一方给予心理同情,另一方接受。这种不对等的交际态势使得同情话语行为不同于正常状态下的语言交际,身处困境中的人往往会对别人的评价十分敏感,他们或与他们相关人士的素质面子由于不幸事件而遭受损失,需要别人用适当方式进行维护。在交际时,同情表述方应清晰地认识对方的这种需求,根据语境选择恰当的言语形式加以应对,如对当事人进行适当的赞扬甚至恭维、关心询问他(她)的身心状况、保证他(她)对相关事务的知情权等。例如:

例(7)(语境:林黛玉丧母初到贾家,王熙凤表示同情。)

王熙凤:天下真有这样标致人物,我今天才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刻不忘。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红楼梦》第三回)

例(8)(语境:马道婆与赵姨娘说起上供之事,马道婆同情赵姨娘处境)

赵姨娘(叹气):阿弥陀佛!我手里但凡从容些,也时常来上供,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马道婆：你只放心，将来熬的环哥大了，得了一官半职，那时你要做多大功德，还怕不能么？

在一个人遭遇不幸时，自己的素质面子往往会受到损伤。素质面子指的是人们渴望他人积极评价自己的个人品质，如能力、好坏等（Spencer-Oatey, 2005）。素质面子涉及个人品质的价值，与个人的自尊感相关，同情话语维护了听话人的素质面子，就是在维护其自尊。在例（7）中，王熙凤说话一开篇就夸奖林黛玉“标致人物”“通身的气派”，突显林黛玉的素质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社会里，家庭观念要强于西方，所以身份面子受到特别重视。在例（7）中，王熙凤说林黛玉“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竟是个嫡亲的孙女”，这是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身份面子，在中国，“外孙女”是外人，只有“嫡孙女”才是家人，这使用了求同准则，维护了林黛玉的社交权利。而在例（8）中，尊重策略则从另外一个方面呈现了中国文化特征。在中国传统观念内，认为“母凭子贵”，马道婆正面评价赵姨娘的儿子就是在维护她的素质面子，赵姨娘当然非常乐意听，她们之间的和谐人际关系由此得到了建构。

Spencer-Oatey（2005）在论述和谐关系建构时指出，交际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交际者的行为期望、面子意识和交际需求三个方面。发话人在别人遭遇不幸、需要安慰时发出同情话语，符合交际的规范；同时，恰当的同情策略针对交际权利缺失进行补救，维护了整体面子和权利，符合行为预期。同情话语在补救交际权利缺失的同时，还维护了对方的平等权利，增强了交际双方的素质面子和身份面子，创设了和谐的人际关系，进而提高了交际效率，满足了交际者的交际需求。建构和谐的人际关系保证了交际的顺利进行，而顺畅高效的交际又是建构和增强和谐的人际关系的重要载体，在这个双向运作机制中，同情话语行使着和谐关系建构功能，显示着语境赋予它的和谐语用意义。

结语

本文把面子维护作为研究同情话语建构和谐关系的入口，通过分析面子的动态概念，认为动态面子观中的交际原则与同情策略相对应，是同情话语建构和谐关系、实现语用意义的基础。通过维护交际权利，使听话人获得平等权利、素质面子和身份面子，从而维护和增强其整体面子。交际过程中，同情话语通过参与、移情和尊重三种策略向听话人进行情感转移，帮助听话人重拾自信，获得平等感。任何交际都是在特定文化语境中进行的，难免会烙上文化印记。汉语中的同情话语交际策略在符合通用礼貌准则的同时，也受到汉语言礼貌准

则的制约, 呈现汉语言文化特色。同情话语以实施话语行为为基础, 以表达同情行为为核心, 以建构和谐关系行为为归宿, 通过维护当事人或非当事人的权利和面子来表达和谐语用意义, 实现和谐交际目标。

参考文献:

- [1] Arnold J. *Affect in Language Learning* [M].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2] Brown H D. *Principles of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M]. Beijing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2.
- [3] Brown P & Levinson S. *Politeness :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 [M].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4] García C. The performance of a rapport-challenging act : blaming [J]. *Journal of Politeness Research*, 2009 (5) : 217~242.
- [5] García C . ‘Cuente conmigo’ : The expression of sympathy by Peruvian Spanish speakers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12 (42) : 408~425.
- [6] Giles H, Coupland N & Coupland J. Accommodation Theory : Communication, Context and Consequence [A]. In Giles H, Couplan J & Coupland N (Eds.) . *Context of Accommodation : Development in Applied Sociolinguistics* [C].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1~68.
- [7] Goffman E. *Interaction Ritual : Essays on Face-to-Face Behaviour* [M]. New York : Pantheon Books, 1967.
- [8] Leech G. *Principle of Pragmatics* [M]. London : Longman , 1983.
- [9] Spencer-Oatey H. *Culturally Speaking : Managing Rapport through Talk across Cultures* [M]. London : Wellington House, 2000.
- [10] Spencer-Oatey H. (Im) Politeness, face and perceptions of rapport : unpacking their bases and interrelationships [J]. *Journal of Politeness Research*, 2005 (1) : 95~119.
- [11] Spencer-Oatey H. Face, (Im) politeness and rapport [A]. In Spencer-Oatey H (Eds.) . *Culturally Speaking : Culture, Communication and Politeness Theory* [M]. London : Continuum, 2008 : 11~47.
- [12] Vanderveken D. *Meaning and Speech Acts Vol. 1* [M]. Cambridge : CUP, 1990.
- [13] 曹雪芹. 红楼梦 [M]. 呼和浩特: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2.
- [14] 陈倩, 冉永平. 有意不礼貌环境下身份构建的和谐——挑战语用取向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3 (3) : 15~28.
- [15] 顾曰国. 礼貌、语用与文化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2 (4) : 11~17.
- [16] 凌来芳. 人际关系管理视阈下的同情言语行为 [J].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

- 学版), 2010 (4): 83~86.
- [17] 钱厚生. 英语礼貌语言手段说略 [J]. 外语研究, 2002 (5): 48~51.
- [18] 冉永平. 人际交往中的和谐管理模式及其违反 [J]. 外语教学, 2012 (4): 1~17.
- [19] 孙亚. 语用和认知概论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20] 肖晶, 吕长弘. 同情准则在汉语与英语中的体现 [J].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 (12): 319~321.

收稿日期: 2016-08-01

作者信息: 周树江, 山东工商学院教授, 264005, 研究方向: 语用学、认知语言学。
电子邮箱: zhoushujiang66@163.com



本刊征订启事

本刊通过邮局及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海外) 征订发行, 每期定价 12 元, 国内邮发代号: 80-630, 国外发行代号: M6997, 敬请广大订户与邮局、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联系订阅。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是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管,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主办, 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高校学报 (双月刊)。

除传统语言学研究、翻译理论与实践、外国文学评论、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等固定栏目外, 学报还将根据各期的关注重点, 设立“名家论坛”“学术争鸣”“学术前沿”“博士新论”“重点项目追踪”“文化研究”“国别研究”“一带一路与国家语言战略研究”“典籍翻译与中国文化走出去”“书刊评介”等机动栏目。另外, 在传统栏目中会不定期举办反映各研究领域最新成果的专栏。